

编者按：吴征镒（1916-）是我国著名的、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，植物区系研究的权威学者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、名誉所长，2008年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主要作品有共80卷126册的中国首部植被专著《中国植物志》等。从履历和专业分工上看，吴先生似乎应该算是一位“理科生”；然而，在知情者眼中，他对文学、音乐等方面的热爱甚至是研究，超过了很多“文科生”，这可以从《戏说说戏——雅志府与麻衣县》、《诗词杂记（五首）》、《比目和同》、《清诗选译赏析》、《仿千字文（一章一韵）》等文章中见一斑，更可以从他对昆曲艺术的造诣和独到理解，从他担任昆明昆曲-古乐研究会顾问，从他因收藏昆曲资料过多而“自诩”为“千曲录富翁”等细节上见一斑。由此，我不经意地想起爱因斯坦的小提琴，想起牛顿的神学，想起罗素的数学……他们都是在某个或者某些领域取得世界级成就的大家，但他们的素养并不停留于那几个方面，他们广博而又深刻，痴迷而又优雅。当然，吴先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看看他回顾自己高中时代的文章，看看那些教育他的老师们，或者，我们对他的成功，以及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础教育，会有一番别样的感触和理解。



旧时扬州中学的老师们

吴征镒

1931~1933年，我在扬州中学（以下简称“扬中”）读高中，是从江都县初二，以同等学力跳考22级普通科的（按：1933年，即民国22年毕业，理论上应说是22届，此处为特殊时代的特定用法，下同）。当时正处在大革命失败之后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开始掌握政权，也还有点励精图治的味道。江苏省教育厅以叶秀峰（叶学习）为主的领导层属国民党CC（陈果夫、陈立夫）系统，对高中教育抓得很紧。当时校长周厚枢（号星北），江都人，曾在美国学制糖工业，回国后在叶秀峰领导下工作。1927年，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和第八中学合并而成扬中，从我五哥（中科院院士吴征铠）那一届（1929~1931）起教学即上轨道，当时考取交通大学当工程师的很多，学校师资力量很强，在全国都很有名。当时，第八中学（扬州府衙门）是初中部，第五师范（大汪边）是高中部，实行初、高中各三年的新学制。扬中那时分普通科和师范科两轨，普通科又分二二普甲和二二普乙两班，我分在二二普乙，全班有五六十人，年龄有大有小（大到23，小到13岁），大多数是旧扬州府所属8个县的。我属于小的，才跨入15岁。

那时扬中师资阵容非常强，比较偏重数理化。数理化念得好，一个是会考可得高分，另一个是将来可

考取交通大学当工程师，有好出路。

教数学的教师汪静斋（名桂荣），身材魁梧，慈眉善目，大腹便便，穿着大褂，被取外号为“汪大菩萨”。他教书很认真，启发性强，深受学生的爱戴。三角、代数、解析几何、立体几何，全都是他教，他讲课时边写、边讲，音容笑貌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“我们啦”、“……啦”、“……啦”之声绕梁不绝。他讲话慢条斯理，很清楚，教出不少好学生。我的同班同学孙本旺，数学最好，高中时就证明过一个数学难题。数学教员还有一位叫黄泰（阶平），教数学和打麻将都精，但我们上他的课比较少。后来他和汪静斋两个，抗战期间在周厚枢率领下在重庆办了国立二中，两人仍是台柱子。其后周校长到台湾办起台湾糖业公司，是否也办了台湾的“扬中”，我未考证过，但总之他带去不少扬中同学，他们都应该算是建设台湾的功臣吧？

我们的物理老师先是薛天游（名元龙），后是黄丹麓，化学老师是邱子进。那时数理化课本全部采用外文原版，如三角是Granville，大代数是Fine。我数学念得也还可以，但本性不大喜欢数理化，这是我后来不考交大而考清华，立志学植物学的主要原因。

除数理化外，中文、英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教师都很整齐。教我们外文的老师先是姓张，后当训育



处主任，接着是汤恂卿。记得汤老师给我们讲莎士比亚的《凯撒大帝》，讲得有声有色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朗读“As Caesar loved me, I weep for him...but as he was ambitious, I slew him”时的样子，“I slew him”拉得很长，看上去有点神经质，于是班里的顽童们管他叫“汤神经”。到三年级时汤老师就不知去向，换了白净文雅的叶长青老师。历史老师叫鲍勤士，是一位有清朝功名的人物。高三国文老师是淮安人张煦侯，样子长得很难看，一口淮安话，但内才很好，听了他的课，我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提高很快。当时国文教学内容有《西厢记·长亭送别》等，还有一些早期留学生的新诗，如“绮色佳城，欢度蜜月去”等。张老师曾讲到王维的《山中与裴迪秀才书》，后来我考清华时，模仿此文风格写了一篇游记，得到朱自清老师的赏识，结果得分比较高。朱老师正是第八中学的校友，他或许是受李更生、任孟闲校长的影响而学文的吧？

生物教材采用的是江都人陈桢所著的《高中生物学》。陈桢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、遗传学家，民国时期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动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。《高中生物学》水平很高，连续印了好几十版。其书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讲到生物学史，如曼德尔是遗传学的创始人等。扬中另一位教生物的朱白吾老师，长得很像曼德尔，后来大家都叫他“曼德尔”。抗战期间，他带领一批师生在泰州一带办起了“流亡学校”，并参加了革命。教过我生物的老师共有三位，一位是唐耀（曙东），后来他在林业科学院当副院长，“运动”中受打击，我把他请到昆明植物所工作。另一位也姓唐，还有一位是吴遐伯。唐耀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，教材就是《高中生物学》。他不但讲课认真，而且很重视课外活动，这与我后来对植物学发生兴趣有很大关系。

我对植物发生兴趣最先是从初中开始的。初一教我们植物的老师是唐寿（叔眉），两江优级师范毕业，当时已是位老教员了。学生们叫他“唐大饼”（扬州一种很普通的早、午后点心），其实他并不是“面团团若富家翁”，却是相当长和倒三角的脸，也在扬中初中部教植物学。他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老师教出来的，不但讲书，而且还带我们观察植物，带我们在教室里解剖，还带我们到野外采标本，如扬州附近的平山堂、禅智寺、东乡、西乡、北乡等等。就这样，大概到高中时我已积累了两百多个标本，就自己学着鉴定。用什么来鉴定呢？就用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，清朝封疆大吏

吴其浚书上的木版图，还用日本早期的《植物图鉴》，因为日本植物和江苏植物有许多相同的。后来自己觉得还不一定可靠，又通过我二哥吴征镒，请南京金陵大学植物学助教焦启源先生重新审查一遍。这事后来被唐耀老师知道了，他为了鼓励学生对生物学发生兴趣，专门找时间为我在班上办了一次展览会，把我的标本全部展出，这对我的鼓励很大。第二年他就结婚了，对象是教育厅督学曹白的妹妹曹觉。我们班顽童很多，他结婚后，我们问唐老师一些结婚的事，还要看他的结婚戒指，结果他很生气，拂袖而去。后来他到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搞木材解剖，可谓我国木材解剖方面的创始人，一直活到93岁。他夫人比他早几年去世，活了八十几岁，他一家都很长寿。唐寿老师活得更长，活了一百岁，抗战后去了台湾，去世后葬在台中。我的第三位生物老师吴遐伯，既精国画，又擅长书法，不但对植物，而且对动物、生理卫生、矿物地学都有基础，讲课就讲这些基础知识，如矿物的硬度，至今我还记得他教给我们的《矿物硬度表》口诀：“滑、石、方、萤、磷，正、石、黄、刚、金。”最硬的是金刚石，最软的是滑石。毕业前我访问他家，他还送我一个折扇，一面写的是李义山的七律二首，至今还记得是“路人犹识郢都麴”，画的则是倪云林派的水墨山水。可惜在1937年8月北平沦陷时，折扇与我的初、高中至大学的作业、绘画等等被一扫而空。

还有一位地理教员，叫万彝香。他是《东方杂志》的爱好者，无论讲中国地理还是外国地理都很形象，讲课很容易让学生记住。比如中国的地形（那时包括蒙古），他说像一片桑叶，上边有蚕在吃桑叶，几个大湖，洞庭湖、鄱阳湖、青海湖等等就是蚕吃的孔；说山东就像一只跪着的骆驼，江苏像一个扑向西边的老人等等。万先生很长寿，大概我最后一次回扬州还在街上看他从一个巷子穿过。

当时中学都是注重“德智群美体”五育并举的。我们的音乐老师李崇祐是低一班的李崇淮的姐姐，她上课多在下午。她弹钢琴教黄自的歌曲“旗正飘飘，马正萧萧”，“白日登山望烽火……”，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……”（依据唐诗谱的），我至今还能唱。业余的昆曲研究会排在放学前，由谢蕲江先生教我们。很多校友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这弦歌之声！体育老师记得有王小商。1932年夏，他率领十几个小朋友（其中有我）到苏州、无锡旅游，虎丘、天平山、梅园、惠山、鼋头渚……足足玩了两个礼拜。他是个黑大个，但当孩子头倒也称职。